

Block, W., Hansen, P. H., & Klein, P. G. (2007). The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Homogeneity: A Critique of Mises and Rothbar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6(2), 457-464.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同质化下的分工:对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批判

沃尔特·布洛克 (Walter Block)

佩尔·亨利克·汉森 (Per Henrik Hansen)

彼得·G. 克莱因 (Peter G. Klein) *

摘要：即使是最狂热的自由贸易捍卫者，例如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也声称贸易不可能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严格同质化的条件下发生。我们表明，由于“自然异质性”、规模经济和学习，即使资源最初是同质的，专业化、贸易和分工也可能出现。

在经济理论中，也许没有比贸易收益的想法更能得到确立的命题了。早在 13 世纪，米德尔顿的理查德 (de Roover 1963: 338) 就阐明了自愿交换互惠互利的观点，并在李嘉图 ([1817] 1951) 的协作法则或比较优势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这些见解并不总是很好地被人理解的。重商主义的贸易观点就受到了 Mises (1966: 664) 所说的“蒙田谬误 (Montaigne fallacy)”——即贸易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使一方受益的信念——的影响。¹

本文试图澄清贸易收益原则背后的一个假设。大多数解释者首先指出，只有当生产要素的属性不同时，贸易才是互惠互利的。因此，资源异质性是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例如，Mises (1966: 157) 指出，“如果地球表面是这样的，即生产的物理条件在每一点都相同，并且如果一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分工就不会为行动的人提供任何好处。” Rothbard (1962: 82) 补充说：“一个事实是，在自然界中各种物种和物体的基本统一性之上，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特别是……会导致专业化的因素尤其存在着多样性：自然资源的位置和类型，以及人类的能力、技能和品味。……很明显，当每一方在所交换的一种财货上具有**生产力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是由于更好的自然给定因素，也可能是由于生产者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交换条件，从而提高参与者的生产力。”此外，Rothbard (1982: 35) 坚持认为：“如果所有人对所有事情都同样精通，同样感兴趣，并且如果所有土地区域都是同质的，则不存在交换的空间。”

* Walter Block 是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的 Harold E. Wirth 经济学杰出学者，他著有十几本书和 200 多篇关于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哲学的学术文章。Per Henrik Hansen 是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是前米塞斯研究所研究员和货币经济学专家。Peter G. Klein 是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兼合同与组织研究所副所长。他的研究重点是企业家精神、产业经济学以及组织和机构的经济学。作者感谢 Laurence Moss (编辑) 和两位审稿人对先前草稿的深刻评论。通常的免责声明适用。

¹ 即使在今天，蒙田谬误仍然困扰着关于外包、“离岸外包”和增加国际资本流动性的讨论。Irwin (2005) 总结了最近关于贸易理论和政策的争议。

我们在此主张，即使所有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完全相同，专业化、贸易和分工也可能发生。我们不否认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观点，即资源异质性足以创造贸易收益。²然而，我们否认资源异质性是使贸易收益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即使在资源同质化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在分工。

假设人类是完全可以互换的；他们拥有相同的技能、能力、主动性、智慧、品味等等。进一步假设，所有的土地也是完全同质的：同样肥沃，浇了同样程度的水，同样被植物覆盖，同样可以使用说得出口的任何设施。此外，我们假设所有的人和资源都随机分布在世界各地；也就是说，没有根据任何独特的——甚至不同的——特征对人或原材料进行分组；无论如何，由于我们的其他同质性假设，这种分组都不可能存在。在这些公认的不切实际的条件下，贸易是否可能发生，或者，是否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被迫完全依赖自给自足的生产？

罗斯巴德对此表示：

在描述发生人际交换必须具备的条件（比如相反的评价）时，我们隐含地假设被交换的必须是**两种不同的财货**。如果克鲁索在岛的一端只生产浆果，而杰克逊在岛的另一端只生产同一种浆果，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交换的基础。如果杰克逊生产了 200 颗浆果，而克鲁索生产了 150 颗浆果，那么假设它们之间会进行任何浆果交换将是荒谬的（1962: 80）。

我们同意罗斯巴德的观点，即至少需要两种财货，但坚持认为资源异质性并不意味着一种财货的模型。例如，假设有两个人，杰克逊和克鲁索，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能力，并且有两种商品，鱼和浆果，这样每个人在开始时可以生产相同数量的每种产品。为了说明的目的，我们假设两者都可以在两天内生产 200 颗浆果和 20 条鱼。我们假设一个没有资本财货的非常简单的世界。浆果是手工采摘的，鱼是用抓来捕捉的，就像熊在抓一样。我们承认，在这些条件下不会发生贸易，生产力当然也无法提高。³

然而，在相当弱的假设下，可能会出现互利交换的条件。首先，个人永远不可能 100% 相同，仅仅因为他们不能占据相同的物理空间。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也有可能（尽管并非必然）他们对互补资源的获取方式不同。想象一下浆果丛与海滩相邻。如果克鲁索站得离浆果丛更近一点，杰克逊离水更近一点，那么克鲁索专门采摘浆果而杰克逊专门捕鱼的交易就会有所收益。也就是说，这两个劳动者除了地点之外，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但他们的生产成本却不同。最靠近浆果的那个人，比最靠近鱼的那个人有着更低的浆果生产成本，诸如此类。

更一般地说，位置是一种独特的属性，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本体论事实。任何资源的一大特征就是它的位置。这意味着，严格来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² 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我们隐含地假设了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足够的知识、支持贸易的法律制度或至少不会对贸易造成太大的破坏，等等。

³ 如果口味不同，交易很可能会发生。让我们假设杰克逊是素食者、草食动物，而克鲁索是肉食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克鲁索会为了杰克逊的鱼而放弃他的浆果；因此，专业化、分工和更高的生产力将随之而来。但是我们假设**完全**同质化，包括口味，所以这个结果被排除在外。

——完全同质的资源。George (2003) 的深刻见解是，没有两块土地是真正相同的，因为土地总是存在于特定位置。位置是不可复制的，这导致了某些特定的收入分配模式。⁴

其次，从主观主义的、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用于生产的资源的价值不是由其客观的、物理的特征驱动的，而是由其在生产结构中的位置（正如企业家所设想的那样）驱动的。⁵即使是物理上相同（受制于刚刚讨论的位置的限制性条款）的资源，在与经济分析相关的意义上也不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想象，克鲁索和杰克逊的岛上也居住着企业家，他们组织鱼和浆果生产，雇用克鲁索和杰克逊作为雇员。克鲁索和杰克逊的劳动在任一生产过程中的“真实”价值是未知的。一位企业家估计克鲁索的边际生产力足以使浆果生产盈利，但不能让鱼类生产盈利，因此他雇用克鲁索，把他放置在经济中的浆果生产过程。另一位企业家随后聘请杰克逊生产鱼。克鲁斯和杰克逊的劳动现在是异质的资源，这意味着他们在经济资本结构中被分配到了不同的位置，尽管克鲁斯和杰克逊是一样的人类。

即使我们忽略了这些关于我们可能称之为“自然”异质性（或“本体论”异质性）的观点，也会有额外的潜在收益来源。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一开始是相同的，但由于他们的行动而变得不同。

让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一点。现在假设克鲁索和杰克逊与浆果和鱼的距离相等。每个人是否仍然有可能“被吸引”到不同的资源，并在此之后专攻该资源，从而提高生产力？这种事态可能被认为是意外，⁶但没有理由排除它。并非每一对克鲁索和杰克逊都会以这种方式安排事情，但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假设的对都不能这样做。如果生产过程的特点是规模报酬递增，那么这种专业化——即使是随机的——会产生净收益。期望这一点似乎并不是不切实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克逊和克鲁索——作为理性的人——会从他们自给自足的经验中意识到，他们生产得越多，他们就做得越好。他们最终也会意识到，生产规模越大，使用工具和最终实现生产机械化的机会就越大。当他们中的一个（我们假设是克鲁索）已经如此意识到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接近杰克逊并向他解释了这一点。然后他们同意各自专注于生产不同的财货，以便在一段时间结束时能够分享更多的两种财货。

他们如何就谁将专攻什么达成一致？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对工作时所使用的工作环境的属性有不同的偏好。生产鱼与“捕鱼”不可分割；一个人可能喜欢捕鱼，而另一个人则喜欢照料浆果植物。但是，他们也可以抽签或干脆同意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生产线。⁷关键是，在意识到潜在的福利收益前景后，杰克逊和克鲁索将非常足智多谋。米塞斯似乎同意这一点，他写道：

⁴ 作者感谢 Laurence Moss 的这一点。有关 Georg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Moss (2001, 2005)。

⁵ 更准确地说，在要素市场上被评价值和定价的不是实物资产本身，而是它们的属性——企业家所设想的资产的特性、功能或可能的用途。关于这一点，请参见 Foss, Foss, Klein, and Klein (2007)。

⁶ 我们对所有与无差异有关的问题进行抽象；例如，如果他们与浆果和鱼的距离相等，他们会像布里丹的驴一样站在那里饿死吗？关于无差异的辩论，参见 Nozick (1977)、Block (1980, 1999, 2003)、Caplan (1999, 2000, 2001)、Hülsmann (1999) 和 Hoppe (2005)。

⁷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实践中的一些好处将会失去，但它仍然可能比没有交易更好。

只要分工下的劳动比孤立的劳动更有生产力，只要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人的行动本身就倾向于合作和协作；人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存在，不是为了神秘的摩洛（Moloch）⁸——社会——而牺牲对自己重要的事物，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福利（1966: 160）。⁹

还有另一种可能更可能实现专业化的方式。克鲁索——已经意识到专业化的潜在收益——可以开始单方面地改变他自己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比例。假设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那么克鲁索的这一行动意味着，从克鲁索相对于杰克逊的角度来看，两种财货在机会成本方面的关系会有所不同。那么，对克鲁索和杰克逊来说两种财货之间不同的边际转化率将为他们之间的有利边际贸易提供基础。克鲁索最初的变化将通过他们的新经验得到加强。

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如果存在“学习效应”（即平均成本是累积产出的递减函数），那么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他的平均成本。¹⁰假设如果他们两人都专业化了（是这两种财货中的哪一种无关紧要），那么每个人的生产力都会得到提高。例如，如果杰克逊只专注于采摘浆果，而克鲁索只专注于捕鱼，让我们假设前者可以在两天内采摘 500 颗浆果，而后者则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捕到 50 条鱼。与各自独立工作、没有贸易的情况相比，他们每个人都可能¹¹拥有更多的两种财货。我们不需要异质性来得出这个结论，只需要专业化提高生产力的假设。在这种地理或“位置”分析中，学习尤为重要。这与典型的均衡经济学教科书模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要么忽略经济学的这些关键要素，要么对它们置之不理。

简而言之，即使在完全同质化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和贸易。这种贸易产生的充分条件就是学习和实践带来进步。这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自由贸易的稳健性：即使面对同质化，它也可以发生。甚至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这样著名的自由贸易捍卫者也没有在他们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这一点。¹²

参考文献

Block, Walter. (1980). “On Robert Nozick’s ‘On Austrian Methodology’.” *Inquiry* 23(4): 397–444.

⁸ 一个闪米特神，其信徒会把小孩献祭给他。——译者注

⁹ 不可否认，异质性对进行分工有相当大的帮助。这真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我们欣然承认，如果没有异质性，专业化的数量将非常少。也许它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它是可能的。尽管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相反，但没有理论上的理由不能这样做。

¹⁰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接受边做边学的理念。Mises (1966: 164) 写道：“特定任务的锻炼和实践，使人更好地适应他们的表现要求；人发展了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却阻碍了其他能力的发展。职业类型出现，人们成为专家。” Rothbard (1962: 82) 补充道：“生产线的全职专业化可能会提高每个人在该生产线上的生产力并加强每个人的相对优势。”

¹¹ 取决于商定的贸易条件；至少，两者都不会少。

¹² 人们可以回应说，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没有打算将上面引用的他们的陈述概括为一个恒定回报而没有学习效果的环境。然而，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打算包括这样的限定词。我们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点。

———. (1999). “Austrian Theorizing, Recalling the Foundations: Reply to Caplan.”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 21–39.

———. (2003). “Realism: Austrian v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Reply to Caplan.”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6(3): 63–76.

Caplan, Bryan. (1999). “The Austrian Search for Realistic Foundat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5(4): 823–838.

———. (2000). “Probability, Common Sense, and Realism: A Reply to Hülsmann and Block.”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4(2): 69–86.

———. (2001). “Probability, Common Sense, and Realism: A Reply to Hülsmann and Block.”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 69–86.

Foss, Kirsten, Nicolai J. Foss, Peter G. Klein, and Sandra K. Klein. (2007). “The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 of Heterogeneous Capit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forthcoming.

George, Henry. ([1879] 2003).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Hoppe, Hans Hermann. (2005). “A Note on Preference and Indifference in Economic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8(4): 87–91.

Hülsmann, Jörg Guido. (1999). “Economic Science and Neoclassic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4): 1–20.

Irwin, Douglas A. (2005). *Free Trade Under Fire*,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ses, Ludwig von. (1966). *Human Action*, 3rd ed. Chicago: Regnery.

Moss, Laurence S. (2001). “Why the Preaching Must Never Stop: Henry George’s and Paul Krugman’s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Free Trade Debate.” In *The Path to Justic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Henry George.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0(5): 135–161.

———. (2005).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Turning Henry George on His Head.” In *The Economics of Henry George*. Ed. John Laurent. Cheltenham, UK: Elgar Publishers.

Nozick, Robert. (1977). “On Austrian Methodology.” *Synthese* 36: 353–392.

Ricardo, David. ([1817] 1951).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In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s. Piero Sraffa and M.H. Dob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Roover, Raymond. ([1963] 1974). “The Scholastic Attitude Toward Trad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Selected Studies of Raymond de Roov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thbard, Murray N. ([1962] 1993). *Man, Economy and State*. Auburn, AL: Mises Institute.

———. ([1982] 1998). *The Ethics of Libert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